

華嚴專宗學院大學部第六屆畢業論文

華嚴五祖與帝王之關係初探

指導教授：陳一標老師

學生：釋天行

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五月

研究動機與目的

華嚴宗在唐代，是一個成長相當迅速，並在很短的時間內，廣為大眾所接受與信仰的一個佛教宗派。尤以高祖以後至武宗以前（除了玄宗、肅宗以外）的幾位皇帝在位期間，華嚴宗一直相當穩定地成長與發展，建寺、譯經、講學、著作等弘法活動，順利地在唐朝盛世流行，並逐漸開展成為中國的八大宗派¹之一。這成就，自然當歸功於華嚴宗祖師們的大力弘宣與推廣。

然而，若同意「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」²，則亦不應忽視唐代幾位帝王與華嚴宗的發展之關連性。於是，就引發筆者探討弘揚華嚴的五位祖師——法順、智儼、法藏、澄觀、宗密，與唐朝帝王之關係的興趣。

筆者有鑑於現今社會之亂象，不管任何事、任何舉動，只要是公眾人物所為，輿論總是投以異樣的眼光，外界多方聯想與揣測之語紛紛出籠，即使是一國之君，也無法倖免。所以，筆者希望本文能夠僅就單純的信仰層面：先以考察華嚴五祖弘化事蹟和唐代帝王之關為主，配合二十四史中之唐史為輔，再參考現代學者之研究成果，來加以探討。

筆者將文本所要探討的主要課題，分為五大部份來敘述：第一、考察華嚴五祖確切之生寂年代，以及生平弘化之重要事蹟；第二、將華嚴五祖生平弘化事蹟，與諸位唐帝間之連繫，以史實舉證的方式，嘗試予以解析分類；第三、由前述解析分類的史實中，配合唐史事證，找出唐帝崇佛的原因，探討其是否為正信？或是迷信？第四、檢討歷朝唐帝大都扶植佛教，何以仍舊造成唐武宗之毀佛？其毀佛之因緣何在？第五、由大唐諸位帝王之崇信佛教，對華嚴宗發展所產生的影響為何？

¹ 指律宗、三論宗、淨土宗、禪宗、天台宗、法相宗、密宗、華嚴宗等流傳於中國之佛教大乘八個宗派。

² 引自暢耀《華嚴寺》（西安：三秦出版社，1993），p.51。

壹、五祖年代與重要事蹟之考察

中國唐代所創立的華嚴宗，一般以為該宗真正的建立是從法藏開始，其傳法世系是：

法順——智儼——法藏——澄觀——宗密

一、五祖生寂年代之沿用

有關華嚴五祖之生寂年代，各傳記及史籍之記載，不盡相同，有時竟有四五種說法。今考證佛教典籍、僧傳、碑銘等之異同，並引用近代多數研究華嚴宗學者所沿用之年代，一般認為華嚴宗初祖終南法順生於陳武帝永定元年，寂於唐太宗貞觀十四年（557~640）；二祖雲華智儼生於隋文帝仁壽二年，寂於唐高宗總章元年（602~668）；三祖賢首法藏生於唐太宗貞觀十七年，寂於唐玄宗先天元年（643~712）；四祖清涼澄觀生於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，寂於唐文宗開成四（738~839）；五祖圭峰宗密生於唐德宗建中元年，寂於唐武宗會昌元年（780~841）³

唐代從唐高祖武德元年（618）到哀帝天祐四年（907），共二百八十九年。華嚴五位祖師中，初祖法順歷經陳、隋二朝，晚年乃處於唐世。二祖智儼活躍的時期，皆處唐代。其餘的法藏、澄觀、宗密三位祖師，生寂年代都在唐朝。而五祖宗密則是在武宗滅佛（845）前四年即圓寂。

二、華嚴五祖重要事蹟之考察

欲了解華嚴五祖之生平弘化事蹟及其與唐皇因緣之相關記事，必先考察五祖個別之傳記，以便知其弘化之行實。⁴

（一）初祖終南法順 557~640

³ 有關華嚴五祖生寂年代之引用，參見陳援菴《釋氏疑年錄》（台北：天華出版社，民 72），p.75、99、106、139、154。

⁴ 有關華嚴五祖生平事蹟，參考南亭法師《華嚴宗史略》（台北：華嚴專宗學院教務處，民 83），p.23-29；以及賢度法師《五祖論著精華》（台北：華嚴專宗學院，民 84）之五祖傳記部份。

初祖俗姓杜，名法順，史稱杜順和尚，相傳為文殊菩薩之化身。雍州萬年縣（今陝西長安縣）人。稟性柔和，操行高潔，學無常師。十八歲時，於因聖寺僧珍禪師處投禮出家。起初為禪僧，後以研修華嚴為志業。著有《華嚴五教止觀》一卷、《華嚴法界觀門》一卷等，其內容包含了華嚴宗最初的判教說和法界圓融的思想，被後世追推為華嚴宗初祖。因他曾長期住在於南山，所以又稱終南法順。

據《高僧傳》中記載杜順和尚之平日行化，說他

「篤性綿密，情兼汎愛，道俗貴賤，皆事邀延。而一其言問，胸懷莫二。或復重痼難治，深願未果者，皆隨時指示，普得遂心。」（大正 50. p653c）

他的生平慈悲法化，有不少為人治病、除害行善的感通事蹟和神異瑞事⁵。是一位實踐的宗教家。德行很高，世人皆稱他為燉煌菩薩。

因為德風傳到宮中，隋文帝對他很是信敬，每日供養米三升。唐太宗時也相當尊崇他的德行和神異事蹟，曾詔請入宮，問治療宿疾的方法。後來賜德號為「帝心尊者」。皇族及朝中重臣，全部跟著歸依信仰他。貞觀十四年，八十四歲，預知時至。入寂前，入大內辭別太宗時，昇上太階殿，化於御床上。太宗留在大內供養七日，並為他建塔於長安南華嚴寺。

（二）二祖雲華智儼 602-668

智儼，別號雲華和尚，又號至相尊者。俗姓趙，甘肅天水人。英敏特達，穎悟非常；經書過目，成誦不忘。十二歲時，經父母應允，隨杜順至終南山至相寺出家。

智儼向來聰慧好學，四處求教。最後才在至相寺智正門下，鑽研《華嚴經》，並發願弘揚《華嚴經》中的教義。於是刻苦精勵，遍覽藏經，討尋眾釋。後來從地論師慧光所撰《華嚴經疏》中，得到啟發，深入領會華嚴別教一乘之地位，和其中關於法界無盡緣起之思想。繼之由於一神異僧的勸告，淘研《華嚴經》中六相的深旨而開悟。從而闡發了「十玄門」、「六相義」等思想，奠定了華嚴宗的主要理論基礎。著作有《華嚴經搜玄記》、《華嚴經內章門孔目章》、《華嚴五十要問答》、《華嚴一乘十玄門》等書。

⁵ 有關法順和尚的感通事蹟及神異瑞事，詳見清·續法《法界宗五祖略記》（卍續 134，p.271b，正面），或其他相關傳記。

智儼平日過著隱居生活，不為人知，直到晚年才致力於華嚴經教的弘傳。據《續高僧傳·法順傳》中說他「神用清越，振績京皋，《華嚴》、《攝論》，尋常講說」。⁶唐高宗經常護持他的講學活動。

智儼圓寂後，傳承並發展他的學說的，是華嚴宗實際創始人法藏。另一弟子義湘⁷，是朝鮮新羅人，學成回國後，於太白山浮石寺傳揚華嚴思想，被譽為海東華嚴初祖。

（三）三祖賢首法藏 643~712

法藏，俗姓康，康居國人。風度奇正，利智絕倫。祖父自康居至長安定居，法藏後來即出生於長安。十六歲時，曾於舍利塔前煉指，誓悟佛乘。十七歲時，為了求法，進入太白山，讀大乘方等經典。後來前往雲華寺聽智儼和尚講《華嚴經》。以後，便以白衣⁸身份，在智儼門下，探究華嚴蘊奧，且深得《華嚴經》玄旨。華嚴宗的基本教義和理論，到法藏時才建立完備。他雖被推為華嚴宗的三祖，而實際上則是華嚴宗真正之創始者，也是華嚴思想之集大成者。

智儼圓寂時，法藏尚未出家，直到咸亨元年（670），法藏二十八歲時，因榮國夫人楊氏奄歸冥路，武后想替母親廣樹福田，捨宅為太原寺，又想度人出家。當時道成、薄塵諸大德，因受智儼和尚圓寂前之顧託⁹，連狀薦舉，法藏才奉敕削染於太原道場，並受詔為太原寺住持，上元元年（674），高宗又降旨命京城十大德為他授滿分戒，賜號賢首。

自唐皇敕成剃染後，法藏受戒及往後其他有關弘法之活動，如翻譯經論、講經、著作乃至興建華嚴寺、弘揚華嚴思想等等，便一直與皇室有密切的關連，甚至直接受唐皇護持而促成者甚多。他曾受詔到岐州法門寺阿育王塔迎舍利，及以經咒法遏除寇虐、祈雨、祈雪等，皆能獲感瑞應。還曾因平叛張易之之亂有功，受中宗策勳，賜贈鴻臚卿的官職。

先天元年（712）十一月，法藏預知時至，先行亂帝別眾，十四日，於西京大薦福寺吉祥而逝。世壽七十，僧臘四十三。帝賜誥賻，贈鴻臚卿，絹一千二百匹，葬事依僧中慣例，其餘皆以官場禮數。後葬於神禾原華嚴寺南，敕諡賢首。

⁶ 大正 50，p.654c。

⁷ 義湘傳華嚴事蹟參見高麗一然《三國遺事》卷四（大正 49，p.1006c-1007b）。

⁸ 指在家人。

⁹ 顧託內容曰：「此賢者注意於華嚴，蓋無師自悟，紹隆遺法，其惟是人。幸假餘光，俾沾制度。已續 134，p.273a，正面」。

送葬之儀，皆用追寵，典屬國三品格式禮。門人請秘書少監閻朝隱撰碑文，概表行跡。

雖然法藏是唐高宗、中宗、睿宗、玄宗、武后五帝門師，中宗、睿宗也禮他為菩薩戒師，中宗還賜號國一。帝王、朝臣都很禮遇他，法藏卻依舊一襲衲衣，堅持戒行及禪定，致力於弘法利生。

他一生參預譯場多次，譯出的經論很多，如舊經《六十華嚴》之補闕、新經《八十華嚴》……等經論。前後共講《華嚴經》三十多遍，其間若有不容易了解的地方，就以譬喻來說明。經常在講經時，看見祥瑞的徵兆。著述很多¹⁰，主要有晉譯《華嚴經探玄記》四十卷、《一乘教義分齊章》四卷、《華嚴經傳記》五卷等約百餘卷（餘詳見其相關傳記）。輪下從學如雲，錚錚嗣法者，有宏觀、文超、智光、宗一、慧苑、慧英等。另一弟子新羅審祥¹¹，輾轉傳《華嚴經》至日本，開創了日本的華嚴宗，成為日本華嚴宗的祖師。

（四）四祖清涼澄觀 738～839

澄觀，字大休，俗姓夏侯，越州山陰（今浙江紹興）人。身長九尺四寸，雙手過膝，口四十齒，聲韻如鐘，目光夜發，晝乃不眵，日記萬言，七行俱下。十一歲時，從寶林寺霽禪師出家。肅宗至德二年（757）在曇一大師門下受具足戒。隱後又從常照禪師受菩薩戒，平日以十誓¹²自勵。早年遍訪名山，廣學佛教三藏典籍，並於外學多方涉獵。大歷十一年（776），遊歷五臺後，住錫大華嚴寺。專闡《華嚴經》，並為其注疏。有「華嚴疏主」之稱。唐德宗貞元十二年（796）奉詔入長安，參與般若三藏譯場，和般若等人共同譯出四十卷本《華嚴經》。

澄觀是法藏圓寂數十年後，中興華嚴宗的一位祖師。他之所以被尊為華嚴宗四祖，直承法藏，乃是由於他以振興華嚴為主要目標，力斥慧苑兩重十玄說和四教說，繼承並弘揚了法藏的五教判釋和十玄教義，與法藏的華嚴思想，一脈相承。又把禪宗引入教法，開了禪教結合的先河。

澄觀生歷九朝而為七帝門師¹³，曾多次受詔入宮，為唐帝及群臣開示佛經大

¹⁰ 法藏之著作湯用彤先生在《隋唐及五代佛教史》第四章（台北：慧炬出版社，民 75），p.208 考證，其所撰現存者二十三部，知名而已佚者約亦有二十餘部。

¹¹ 參見慈怡《佛光大辭典》（高雄：佛光出版社，1988），p.5978b-c。

¹² 關於澄觀十誓，在《會玄記》所收《妙覺塔記》之敘述與《法界宗五祖略記》之內容同，而與《宋高僧傳》異，兩者之比較參見鎌田茂雄《中國華嚴思想史研究》（東京：東京大學出版會，1965）p.161。

¹³ 澄觀所歷九宗聖世為：玄宗、肅宗、代宗、德宗、順宗、憲宗、穆宗、敬宗、文宗九位皇帝；

旨，或闡揚《華嚴經》等。曾受封為清涼、大照、大統國師等號，及教授和尚、鎮國大師、進天下大僧錄之號等。唐憲宗曾賜他僧統清涼國師之號，統冠天下緇侶，主教門事。不僅文宗從他受心戒，中外台輔重臣，也都以八戒禮向他學習。

澄觀畢生闡揚《華嚴經》前後五十遍，無遮大會一十五設。著述現今流傳者有：《華嚴經疏》六十卷，《華嚴經隨疏義鈔》九十卷、《貞元新譯華嚴經疏》十卷等，總共四百多卷。其中有幾部是皇室群臣請述的，如《貞元新譯華嚴經疏》和《行願品經別行疏》就是唐德宗所詔造。

文宗開成四年（839）三月六日，付法囑累高足弟子後圓寂。俗壽一百零二，僧臘八十三。文宗以祖聖崇仰，特令輟朝三日，重臣縞素。並下旨奉其全身塔於終南山。日後啟塔闍維，得舍利數千粒，明光瑩潤。舌如紅蓮，火不能變。唐帝敕謚，仍號清涼國師，賜塔額曰妙覺。詔相國裴休撰寫碑記，及國師真儀，奉安大興唐寺。

其門下弟子眾多，其中宗密繼承他的學說，進一步發展了他禪教結合的思想。

（五）五祖圭峰宗密 780~841

宗密，俗姓何，果州西充（今四川成都）人。出身富家，年少時學儒學。二十歲左右，開始聽習佛典經論，止葷茹素，親近禪宗大德。憲宗元和二年（807），從遂州大雲寺道圓禪師出家，修習禪法。後來因為讀到澄觀所撰的《華嚴經疏》，深得旨趣，就前往澄觀門下，求教華嚴數年。他禪教兼學，日後，提出了禪教一致的理論，統攝佛教內部各派的思想。並會通五教，以化解教內外紛爭。是華嚴宗第五位祖師，也是荷澤禪的繼承者。因他長期住在陝西圭峰草堂寺，所以學者稱他為圭峰大師。

宗密剛開始時，四處游歷。能夠讀到澄觀的《華嚴經疏》，是因為元和五年（810），游歷到襄漢，在恢覺寺遇到澄觀的弟子靈峰時，所獲贈的，讀後就講給大眾聽。一直到元和六年（811）才和澄觀通信¹⁴。不久，也就到澄觀門下學習，深蒙印可，晝夜隨侍左右。

數年請益後，宗密在元和十一年（816），住在終南山智炬寺靜修，遍覽藏經三年，也開始著書。長慶元年（821），退居鄠縣草堂寺。前後著有《華嚴經行願

而七帝則指自代宗至文宗七位唐帝而言。

¹⁴ 有關宗密與澄觀通信之內容，詳見宗密《圭峰定慧禪師遙稟清涼國師書》（大正 39，p.576c-578c）。

品別行疏鈔》、《注華嚴法界觀門》、《原人論》、《禪源諸詮集都序》等，總共九十餘卷。

太和二年（828）慶成節，文宗召見入殿，賜紫方袍，敕號為大德。當時的山南尚書溫造，曾請問佛法。其餘朝臣及百姓，歸信者多。宰相裴休經常跟從他學習教法，並深入宗密學說堂奧而作他的護法。

武宗會昌元年（814）正月六日，坐滅於興福塔院。閱世六十二，僧臘三十四。道俗奉全身於圭峰茶毗，得舍利數十粒，顏色皆鮮明白潤。相國裴休為他撰寫碑文。至宣宗，追謚定慧禪師，賜塔號青蓮。

貳、史事舉證試析分類

以上，大略敘述華嚴五祖之生平弘化大概情形。現將逐條列舉五祖之弘化活動，與唐代皇室較有關係的史實，並嘗試將它們區分為：請法、感應、加封、護法、度僧、建寺、譯經、講學、授戒、著作及祖師與皇室政要的交往等十一類。

一、請法

請法，可說是為了深入探索佛法智慧大海之舉動。可幫助正確理解佛法，由迷啟悟，以堅定信仰。

長安四年冬杪，武后詔法藏大師至長生殿，問「六相十玄」之旨。法藏乃指殿隅金獅子喻曉之。至一一毛頭各有金獅子，一一毛頭獅子同時頓入一毛中，一一毛中皆有無邊獅子，如是重重無盡，后乃豁然¹⁵。¹⁶

代宗大歷年間，一日，詔澄觀大師入內禁，問佛經大旨。澄觀回答條然有緒，代宗於言下豁悟。遂事以師禮，恩渥彌厚。

貞元七年，河東節度使李自良，請澄觀大師於崇福寺講新疏。德宗聞其風，派遣中使李輔光宣詔入都，問佛法大意。

貞元十二年四月，德宗聖誕，又詔請澄觀於麟德殿開示《新譯華嚴》宗旨。群臣大集，師陞高座，說曰：「我皇御宇，德合乾坤。光宅萬方，重譯來貢。特回明詔，再譯真詮。觀顧多天幸，承旨幽讚。極虛空之可度，體無邊涯，大也；竭滄溟而可飲，法門無盡，方也；碎塵刹而可數，用無能測，廣也；離覺所覺，朗萬法之幽邃，佛也；芬敷萬行，榮耀眾德，華也；圓茲行德，飾彼十身，嚴也；貫攝玄微，以成真光之彩，經也。總斯經題之七字，乃為一部之宏綱。將契本性，非行莫階，故說普賢無邊勝行。行起解絕，智證圓明。無礙融通，現前受用。」帝大悅，讚曰：「妙哉言乎！微而且顯。」賜紫衲方袍，禮為教授和尚。

¹⁵ 據《釋氏稽古略》卷三（大正 49，p.821a），武后詔法藏大師至長生殿問「六相十玄」時為長安元年，與清·續法《法界宗五祖略記》（卍續 134，p.274b，正面）記載為長安四年，年代有異。筆者以為，雖年代記載有異，而事蹟皆同，應為可信之史實。

¹⁶ 此處第貳部份所列舉華嚴五祖與唐帝室接觸之弘化事蹟，若無特別註釋，都可參見清·續法《法界宗五祖略記》（卍續 134，p.271a，反面—p.278a 正面）。

貞元年間，順宗在東宮，仍為皇太子時，即曾以「心要」遣問於清涼國師。國師答書上說：「至道本乎一心，心法本乎無住。無住心體，靈知不昧。性相寂然，包含德用。迷現量則惑苦紛然，悟真性則空明廓徹。雖即心即佛，惟證者方知。」¹⁷

憲宗元和五年，帝詔澄觀大師入內談法。帝問：「華嚴所詮，何謂法界？」師曰「法界者，一切眾生身心之本體也。從本已來，靈明廓徹，廣大虛寂，唯一真境而已。無有形貌而森羅大千，無有邊際而含容萬有。昭昭於心目之間。有相不可睹；晃晃於色塵之內，而理不可分。非徹法之慧目，離念之明智，不能見自心如此之靈通也。故世尊初成正覺，歎曰：『奇哉！我今普見一切眾生，具有如來智慧德相，但以妄相執著，而不能證得。』於是稱法界性，說《華嚴經》。全以真空揀情，事理融攝，周遍凝寂。是之謂法界大旨。」憲宗聽玄談已，廓然自得。即敕有司，別鑄金印，遷賜僧統清涼國師之號，統冠天下緇侶，主教門事。

二、感應

感應，是決定信仰的重要關鍵。大部份人由感應入佛法大門。感應愈頻繁者，信仰愈虔誠，信心愈堅定。

唐太宗貞觀年間，一日，詔請杜順和尚入內，問曰：「朕苦寒熱，久而不愈，師之神力，何以蠲除？」和尚唯曰：「聖德御宇，微恙何憂？但頒大赦，聖躬自安。」太宗從之。疾遂廖。因而賜號「帝心」。

長壽年間，法藏大師於雲華寺講百千經時，有光明現從口出，須臾成蓋，眾所具載。延載元年，講至〈十地品〉，天華四散，五雲凝空，崇朝不輟，香彩射人。

證聖元年三月，帝詔法藏於東都大遍空寺，同實叉難陀再譯《華嚴》。弘景、圓測、神英、法寶諸德共譯，復禮綴文，藏為筆受。譯堂前陸地開百葉蓮華，眾睹禎祥，競加精練。

神功元年，邊寂拒命，唐皇出師討代，特詔法藏大師依經咒法，遏除寇虐。藏豐浴更衣，建立十一面觀音像，持准神咒經。行道始數日，崩城之外，將士聞

¹⁷ 據元，普瑞《華嚴懸談會玄記》所錄〈妙覺塔記〉（卍續 12，p.4b，反面）載：順宗問心要之年為貞元己卯，即貞元十五年（799）。

天鼓之聲；良鄉縣中，賊眾睹觀音之像。月捷以聞，優詔慰勞。

聖歷二年，帝敕令法藏法師於佛授記寺講新譯《華嚴經》。至華藏世界海震動之文，講堂及寺宇忽然震吼。道俗數千，歎未曾有。

景龍二年，中夏憫雨，帝敕令法藏大師集百法師於薦福寺，以法禱之。近七期，遽致滂沱。詔曰：「敷百座以祈恩，未一旬而獲應。師等精誠，均沾法液。」七月復旱，感驗如初。又敕曰：「慈雲演蔭，法雨含滋。師等熏修，遽蒙昭感。」由是中宗禮為菩薩戒師，賜號「國一」。

景雲二年，冬不下雪，詔法藏大師入禁中問之。師曰：「有經名《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》，若能結壇作法，寫是咒語，投於龍湫，應時必獲。詔可其請。遽往藍田山悟真寺龍池所作法，未旬大雪。表奏上聞，制報曰：「敕華嚴師，啟請祈恩，三寶流慈，兩度降雪。精誠上感，遂乃盈尺。」慮不周洽，且未須出，及六出遍四方，復降詔曰：「敕華嚴師，法體如何！焚香纔畢，旋降瑞雪。雖則如來演說，實由啟懇誠切。」

三、加封

加封，對和尚而言，是皇帝對其引導進入佛法領域的法師，一種感恩圖報的方式。也是表達對其德行之崇尚，可為群眾效法之對象。

貞觀六年，太宗詔杜順和尚入見，賜號「帝心」。

上元元年，高宗有旨命京城十大德為法藏授滿分戒。賜號「賢首」。¹⁸

神龍元年，平叛張易之等凶徒後，帝賜法藏大師以「鴻臚卿」職。

景龍二年，中宗禮法藏大師為菩薩戒師，賜號「國一」。

先天元年，賢首法師法藏寂。贈「鴻臚卿」，葬神禾原。敕謚「賢首」。

¹⁸ 據《佛祖統紀》卷 29（大正 49，p.293a）、《釋氏稽古略》卷 3（大正 49，p.821a）、《隆興編年通論》卷 14（卮續 130，p.280a，反面）之記載，法藏受具戒及賜號「賢首」，是武則天在萬歲通天元年降所下的旨意。然法藏 28 歲出家時為咸亨元年（670），至萬歲通天元年（696）法藏已經 54 歲。筆者以為法藏受具戒在出家後四年，即上元元（674）之可能性較大。

貞元十一年，四月帝誕節，詔澄觀法師入內殿講經。因以妙法清涼帝心，賜號清涼法師，教授和尚。¹⁹

貞元十五年，澄觀大師受詔「鎮國大師」號，進「天下大僧錄」。四月帝誕節，復以「清涼」賜為國師之號。

元和五年，帝敕有司，別鑄金印，遷賜澄觀大師以「僧統清涼國師」之號。至穆宗、敬宗朝，悉封「大照國師」。

開成元年，文以澄觀大師百歲壽誕，賜衣財食味，加封「大統國師」。

開成三年，澄觀大師寂。敕謚仍號「清涼國師」，賜塔額曰「妙覺」。

太和二年慶成節，文宗詔宗密法師入內殿問法。賜紫方袍，敕號「大德」。²⁰

宣宗朝，追謚圭峰宗密大師曰「定慧禪師」，塔號「青蓮」。

四、護法

護法的範圍容攝廣泛，這裡所指的是唐皇對華嚴五位祖師的四事供養。其餘或分別歸於度僧、建寺、譯經、講學等類，此不贅述。

智儼和尚晚年弘法講《華嚴》時，當時的皇太子（應為後來的唐高宗）常頻命府司優事供給，使和尚法輪常轉不輟。²¹

法藏大師承旨於太寺講百千經時，時屬端午，天后曾遣使送衣五事。²²其書曰：「蕤賓應節，角黍登期，景候稍炎。師道體清適，屬長絲之令節。承命縷之嘉辰，今送衣裳五事，用符端午之數。願師承茲采艾之序，更茂如松之齡。永耀

¹⁹ 據《釋門正統》卷 8（卍續 130，p.456b，正面）、《佛祖統紀》卷 29 及 41（大正 49，p.293b、380a）所載，澄觀受詔入內殿講經、受賜清涼國師之號，為貞元十一年。而據《佛祖歷代通載》卷 14（大正 49，p.609c，則為貞元十二年。

²⁰ 據清·續法《法界宗五祖略記》（卍續 134，p.277a，反面）、《釋門正統》卷 8（卍續 130，p.456a，反面）《釋氏稽古略》卷 3（大正 49，p.821c）記載，文宗詔宗密入內賜紫方袍並敕號之年，為太和二年；若據《佛祖統紀》卷 29 及 42（大正 49，p.293c、385b）則為太和九年。

²¹ 參見法藏《華嚴經傳記》卷 3（大正 50，p.163c）。

²² 五事是指塗香、華鬘、燒香、飲食、燈明等五種供養物。

傳燈，常為導首。略書示意，指不多云。」²³

證聖元年三月，法藏於東都大遍空寺譯經時，則天太后時幸其寺，親受筆削，施供食饌。

太極元年十一月二日，太上皇睿宗因法藏大師壽誕，賜衣財暨食味。誥曰：「敕華嚴師，欣承載誕之祥，喜遇高禩之慶。乘茲今日，用表單心。故奉法衣，兼陳湯餅。願壽等恆沙，年同劫石。別賜絹二千匹，俾瞻興福所須。」

開成元年，以澄觀清涼國師百歲壽誕，文宗賜衣財食味，加封大統國師。

五、度僧

「弘法須人，度僧為要。」²⁴唐朝時有度僧制度，須逢國家有盛大典禮時，才會舉行。並以試經而取德業精明者度之。亦有由有德之者薦舉，方得度者。私度者較少。

咸亨元年，法藏年二十八，屬榮國夫人奄歸冥路，則天皇后廣樹福田度人，則擇上達僧，捨宅乃成太原寺。於是受顧託者連狀薦推，由是法藏奉敕削染於太原道場，並詔為住持。

另據《法界宗五祖略記》，言澄觀大師為天寶七年，奉恩試經得度者。²⁵

六、建寺

建寺若由皇帝玉成，則可使主持者，更無憂經濟上之不足，亦能吸引各方遊僧長住。華嚴宗創宗前起建的華嚴寺，就是法藏大師向唐皇奏請所建成的。

景龍二年，法藏大師奉詔祈雨獲瑞應後，即秦請於兩都（即長安、洛陽）及吳、越、清涼山等五處起寺，均標榜「華嚴」之號，仍寫三藏並諸家章疏貯之。尋復請許，雍洛閭閻爭趨梵筵，普締香社。於是乎像圖七處，數越萬家。

²³ 詳見新羅·崔致遠《大唐大薦福寺故寺主翻經大德法藏和尚傳》第四科（大正 50，p.281b）。

²⁴ 語見《祖統統紀》卷 51（大正 49，p.453a），貞觀二十二年玄奘之言。

²⁵ 據《釋門正統》卷 8（卍續 130，p.456a，正面）所載澄觀奉恩得度之年，與《法界宗五祖略記》（卍續 134，p.275b，正面）同為天寶七年，澄觀十一歲時；而據《釋氏稽古略》卷 3（大正 49，p.821b）與《神僧傳》卷 8（大正 50，p.1004b）則澄觀為十四歲時遇恩得度。

七、譯經

唐代的譯經基本上由國家主持。《八十華嚴》、《四十華嚴》和晉譯《六十華嚴》的補譯闕文，就都是在唐代宗成的。曾參與此譯場者，五祖中，只有法藏和澄觀。

永隆元年，法藏奏請與日照三藏補譯晉譯六十卷本《華嚴經》之缺文。就於西太原寺，譯出〈入法界品〉內兩處脫文。一從摩耶夫人後，彌勒菩薩前，中間天主光等十善知識；二從勒菩薩後，至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善知識前，中間文殊申手過一百一十由旬按善財頂。

證聖元年三月，詔法藏於東都大遍空寺，同實叉難陀再譯《華嚴》。弘景、圓測、神英、法寶諸德共譯，復禮綴文，藏為筆受。次移佛授記寺譯，至聖歷二年十月八日譯畢。為八十卷本《華嚴經》。

貞元十二年，德宗宣河東節度使禮部尚書李詵，備禮迎師（澄觀）入京，詔其同闕寶三藏般若翻譯烏荼國所進華嚴後分梵夾。師承睿旨，於六月五日為始翻譯，帝親預譯場。一日不至，即命僧寂光依律說欲云：「皇有國事因緣，如法僧事，與欲清淨。」至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譯就，共四十卷，進上。

八、講學

《華嚴經》和華嚴宗的理論，一般信眾較不易理解，要使群眾信仰，講學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。

上元元年，法藏受詔於太原寺講《華嚴》（指六十卷本）。

延載元年，法藏法師講《華嚴經》至〈十地品〉時，天華四散，五雲凝空，崇朝不輟，香彩射人。

登封元年，帝詔賢首國師於太原寺講大經（指《八十華嚴》）。

聖歷二年十月，敕法藏法師於佛授記寺講新譯《華嚴經》。

泊臘月望前三日晚，講至華藏世界海震動之文，講堂及寺宇欻然震動。當寺龍象，具表奏聞。十九日御筆批答云：「因敷演微言，弘揚秘蹟。初譯之日，夢甘露以呈祥；開講之辰，感地動而標異。斯乃如來降跡，用符九會文耳。豈朕庸虛，敢當六種之震？披覽來狀，欣惕於懷。」

法藏一生前後講《華嚴經》三十餘遍，且擅長譬喻，更具吸引聽眾的力量。史載其曾為「不了無盡法界重重帝網義者，又為設巧方便，取鏡十面，八方安排，上下各一，相去一丈餘，面面對，中安一佛像，然一燈以照之，互影交光，學者因曉剎海涉入重重無盡之旨」。²⁶由此，輪下從學如雲，莫能悉數。

貞元十五年，帝誕節，德宗敕有司備儀輦迎教授和尚澄觀入內殿，闡揚大經。師陞座曰：「大哉真界，萬法資始。包空有而絕相，入言象而無跡。我佛得之，妙踐真覺，廓盡塵習。融身剎以相含，流聲光而遐燭。我皇得之，靈鑒虛極，保合太和。聖文掩於百王，淳風扇於萬國。《華嚴經》者，即窮斯旨趣，盡其源流。故恢廓宏遠，包納沖邃，不可得而思議矣。失其旨也，徒修因於曠劫。得其門也，等諸佛於一朝。諦觀一塵，法界在掌。理深智遠，識昧辭單，塵黷聖聰，退座而已。」帝時默湛海印，朗然大覺。顧謂群臣曰：「朕之師，言雅而簡，辭典而富，扇真風於第一義天，能以聖法清涼朕心。」仍以清涼賜為國師之號，由是中外台輔重臣，咸以八戒禮而師之。

九、授戒

唐高祖武德二年（619）曾設置十大德，令其管理僧尼，網羅法務²⁷，如為僧眾授具足戒等，法藏即是唐高宗上元元年降旨命此十大德為其受具足戒。而白衣願受佛教戒律之約束，則為顯示他奉行實踐的決心。景龍二年，法藏法師與百法師祈雨獲應，中宗禮為菩薩戒師，並賜號國一。

太極元年七月，彗星現。睿宗詔華嚴和尚（法藏）為菩薩戒師，受心地戒。²⁸

太和五年，文宗受心戒於澄觀大師，誓不食蛤。

十、著作

華嚴祖師某些著作，是奉詔而作的，一方面顯示唐帝深入經藏的求知慾，一方面則能令佛法，更加普遍適應社會各階層，而且流傳更久遠。

²⁶ 見清·續法《法界宗五祖略記》（卍續 134，p.274b，反面）。

²⁷ 見中村元著·余萬居譯《中國佛教發展史》上〈唐朝與僧官〉（台北：天華出版社，民 73），p.220。

²⁸ 另據《佛祖統記》卷 40（大正 49，p.372c）載，睿宗請法藏大師為他授菩薩心戒時為景雲元年。

唐德宗貞元年間，帝詔澄觀令造《新譯華嚴》後分經疏。澄觀奉旨，撰述後分《疏》十卷、《行願品經別行疏》一卷。當時的皇太子（後來即位之順宗），亦曾請述《了義》一卷，並《食肉得罪因緣》一篇。另七聖降誕節對御講經談論文，兼一家詩牋表章，總八十餘卷。

十一、與皇族政要的交往

唐代皇室中，由於皇帝的禮遇華嚴宗，賜予華嚴祖師特殊的榮譽，吸引了許多名士的信仰華嚴，也成為祖師的朋友。比較下，法藏、澄觀、宗密與皇族政要交往是更為頻繁。由傳記中的記載可以看出，法藏當時與唐帝的關係最為密切。而據《宋高僧傳》，記錄許多權貴名臣與澄觀的交遊，相國齊抗、韋太常渠牟是結交最深的；其他如武元衡、鄭綯、李吉甫、權德輿、李逢吉、錢徽、歸登、嚴綬、孟簡、韋丹等，他們都是欽慕清涼國師的德風，跟從他學習或受戒而成為朋友。

另外，與宗密往來的名士，在冉雲華著《宗密》一書中，曾探討到當時政壇中李逢吉、白居易、劉禹錫、蕭俛、溫造、裴休、李訓等經常來往²⁹，尤與裴休之過從甚密。據清·續法著《法界宗五祖略記》載，相國裴休是宗密「深入堂奧而為外護」³⁰的弟子。在裴休為宗密所撰的《圭峰禪師碑銘》中，自述：「休與大師，於法為昆仲，於義為交友，於恩為善知識，於教為內外護。」³¹另外，由《舊唐書·李訓傳》中載「訓與密素善」，得知宗密平日就與李訓感情良好，傳中敘及當年發生「甘露之變」時，他曾經為了救李訓，遭受波及，險被殺害，但在緊要關頭，仍表現出無畏的精神，還說：「與訓游久，浮屠法遇困則救，死固其分。」³²可見宗密的交遊廣闊，或許是受他慈悲心懷的影響，難怪裴休為他手撰碑文的時候，形容他是「真如來咐囑之菩薩，眾生不請之良友」³³。

²⁹ 有關冉華探討宗密與政壇名士交之情形，詳見其著作《宗密》（台北：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，民 77），p.29-37。

³⁰ 見清，續法《法界宗五祖略記》，卅續 134，p.277a，正面。

³¹ 見裴休《佳峰禪師碑銘》，《全唐文》卷 743。

³² 詳見《新唐書》列傳卷 104〈李訓傳〉。

³³ 見裴休《佳峰禪師碑銘》，《全唐文》卷 743。

參、唐帝崇佛的原因：正信與迷信之差別

許多研究中國佛教的現代學者，當他在探討唐代佛教發展的情況時，經常可以見到類似如下的文字敘述：

「唐代諸帝對於佛教的態度，出於真正信仰者較少，普遍地是從政治上考慮。」³⁴

或者是

「唐王朝（中略）除了武宗李炎是反佛的以外，其餘的，大體上都是扶植利用佛教的。」³⁵

甚至更有人認為

「在中國的諸帝王中，則天武后是在政治上徹底利用佛教的統治者。」³⁶

諸如此類。

然筆者在此姑且不去論述唐代佛教的發展與唐有關「政治考量」或「扶植利用」的層面。因上述的唐皇崇信佛教，護持佛法不落人後的舉動，已是不容爭辯的史實。筆者所關心的，是想就這些史實，單純地來了解唐帝的信仰佛教，究竟是正信或是迷信？

然而，僅遷就這些有限的記事，要來判別唐皇的正信與迷信，是很難有一個清楚的分際，也很難做出一個客觀合理的評斷的。因此，在此筆者將從五個角度，分別地來加以探討。

一、從所列舉的史實來探討

通常，人們給予迷信的定義是對事情的真相，不分、不辨，過份盲目地順從。

³⁴ 見杜繼文，任繼愈編著《佛教史》（台北：曉園出版社，1995），p.280。

³⁵ 見郭朋《中國佛教史》（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民82），p.150。

³⁶ 見鎌田茂雄《中國華嚴思想史口研究》（東京：東京大學出版會，1965），p.146。

而正信則是仰賴理智的分辨，而生出堅定的信心，此信心不因遭逢諸異道而稍生疑念。

從上述有關唐皇諸帝請法求知的史實來看。例如，唐德宗貞元年間，頻頻詔請澄觀入內殿，開示新譯《八十華嚴》宗旨及講《華嚴經》。又，順宗未登基前，曾問心法於澄觀，澄觀回答他的書信後，還為他作「心要」一卷，內容陳一乘心道，直指法體，正顯自心，這是有關深入修行實踐的問題。元和年間，憲宗曾詔問澄觀華嚴所詮之法界。女皇帝武則天也曾詔法藏大師問法，及問六相十玄之旨。這種屬於難以理解的哲學方面的問題，華嚴的祖師們屢次受詔入宮，為唐皇解答他們對佛法的疑慮。

從唐帝們得到祖師們回答後的態度來看，唐帝們對所得的回答，是給予肯定的評價並且深加讚許的。也因為這樣，唐帝們對於教導他們的和尚加以信任與護持，除了賜以國師或教授和尚等封號，以表達對他們的崇敬外，供養三寶、支持譯場譯經、給予對群眾講經弘法的機會、華嚴寺的建立、華嚴的著述立說，及其他廣度僧尼等護法的事項，樣樣躬親實踐。其中幾位唐帝，甚至還受了菩薩戒，顯示他們發願身體力行的決心。

這種種事證，不難發現唐帝們並非一味地崇信，而是經由解除對法的疑惑，了解佛法內容後，進而肯定自己的信念，而採取實踐修學、護持佛法的舉動。這恰好合乎佛教修行信、解、行、證次第的前三步驟。

二、從詔文來探討

筆者從幾位唐帝他們為政策施行而頒布的詔文中，得知他們對於佛法認知的程度。舉例來說，太宗在某次詔告天下，準備廣度僧眾的文中，有一段敘述：

「其天下諸寺有寺之處，宜令度人為僧尼。……，務須精誠德業，無問年之幼長。其往因減省還俗，及私度白首之徒，若行業可稱，通在取限。必無人可，亦任其闕數。……。多有僧徒，溺於流俗，或假託神通，妄傳妖怪；或謬稱醫筮，左道求財；或造詣官曹，囑致贓賄；或鑽膚焚指，駭俗驚愚。……。有一於此，大虧聖教。朕情深持護，必無寬捨。……。務使法門清整。……伽藍淨土，咸知法味，菩提覺路，絕諸意垢。」³⁷

³⁷ 引自《全唐文》卷五，太宗〈度僧於天下詔〉，p.23。在另一紙太宗〈佛遺教經施行敕〉（《全

從此段詔文中，可以看出太宗皇帝對佛教的了解和正信。他希望度的僧眾是學問德行都很高的弘法人才，不分長幼，寧缺勿濫，並且希望當時的佛教僧團是清淨無染的。

而在另一段他〈為戰亡人設齋行道〉的詔文中，則可直出太宗對佛陀無緣大慈、同體大悲，弘濟眾生出輪迴苦的教法，有相當的體驗。詔文中說：

「竊以如來聖教，深尚慈仁，禁戒之科，殺害為重，永言此理，彌增悔懼。今宜為自征討以來，手所誅剪，前後之數，將近一千，皆為建齋行道，竭誠禮懺。朕之所服衣物，並充檀捨。冀三途之難，因斯解脫，萬劫之苦，藉此宏濟，滅怨障之心，趣菩提之道。」³⁸

就像睿宗李旦曾經說過釋典確有「拯人化俗」³⁹的教化之功能。不但能安定社會與安撫民心，唐帝的大赦天下及禁斷屠殺⁴⁰，也深受佛法慈悲感化而頒布施行。

三、從所興辦之慈善事業來探討

談到唐皇因深受佛法感化而施行大赦天下及禁斷屠殺，就必須說到唐代設在寺院裡相當著名的一個慈善機構——悲田養病坊。

這個機構首創於武則天長安年間（701-704），原本是兼管悲田⁴¹、治病、施藥三院的社會事業機構。⁴²起初統一派遣俗官管理，開元五年（717），宋璟、蘇頌等人上奏言：「所稱悲田乃關釋教，此是僧尼職掌，不合定使專知，請令京兆按此分付其家。」⁴³玄宗未答應。開元二十二年（734），玄宗下詔，又將京城內的貧兒全部收容於各寺院的病坊。會昌法難之後，因掌管養病坊的僧尼都已被迫還俗，悲田坊沒人主持，恐怕貧病者求救無門，困窮無依，李德裕才奏請改為「養

唐文》卷九）內容中，亦可看出其對佛教的了解與正信。

³⁸ 詳見太宗〈為戰亡人設齋行道詔〉（《全唐文》卷五），p.19a。

³⁹ 參見《舊唐書·睿宗本紀》。

⁴⁰ 《舊唐書·武宗本紀》中載：「齋月禁斷屠殺出於釋氏國家」。卻由於武宗個人對宗教之好惡，於會昌年四頒布〈除齋月斷屠敕〉（《全唐文》卷77）而廢。

⁴¹ 悲田與敬田、恩田合稱三福田。以悲愍之心救助貧困，能得無量之福分，故救濟貧困或救助貧者皆稱為悲田。《像法決疑經》謂，佛、法、僧三寶為敬田，貧窮孤老乃至蟻子等則為悲田。依准此義，唐代時有悲田院之設立。

⁴² 參見鎌田茂雄著·鄭彭年譯《簡明中國佛教史》，收於藍吉富主編《世界佛學名著譯叢42》台北：華宇出版社，民77），p.211。

⁴³ 李德裕〈論兩京及譜道悲田坊狀〉（《全唐文》卷704）。

病坊」，全部由俗官來接管。⁴⁴

由「悲田出於釋教」⁴⁵一語，可以知道，原來唐皇最初在寺院設置悲田養病坊，是受到佛教信仰的影響，也可看出唐皇頗信解佛教布施受福的觀念。

四、從唐皇所撰序文及讚文來探討

幾位信佛的唐皇，曾為當朝翻譯的佛經寫序文，或為他們所崇奉的和尚製讚文。從這些序文或讚文中，也可看出撰作此文的唐皇，對佛法了解的情形。舉中宗所作〈賢首國師真讚〉為例⁴⁶，讚文中言：

「宿植明因，專求正真，奄園晦跡，蓮界分身，闡揚釋教，拯濟迷津，常流一雨，恒淨六塵。辨圓方開，言泉廣濬，護持忍辱，勤修精進，講集天華，微符地震，運斯法力，殄慈魔障。爰標十觀，用契四禪，並斷煩惱，遐祛蓋纏，心源鑒微，法鏡澂懸，慧筏周運，慈燈永傳。名簡紫宸，聲流紺域，梵眾綱紀，僧徒楷則，鎮洽四生，曾無懈怠，播美三千，傳芳百億。」⁴⁷

從這篇讚文中，除了看出中宗對法藏的讚賞外，也顯示他對佛教修行內容和目的有相當深刻的了解。

再舉武后為《八十華嚴》所作的序文來談⁴⁸，序文中有一段敘述言：

「雖萬八千歲，同臨有截之區；七十二君，詎識無邊之義。由是人迷四忍，輪迴於六趣之中；家纏五蓋，沒溺於三途之下。及夫驚巖西峙，象駕東驅。慧日法王，超四大而高視；中天調御，越十地以居尊。包括鐵圍，延促沙劫。其為體也，則不生不滅；其為相也，則無去無來。念處正勸，三十七品為其行；慈悲喜捨，四無量法運其心。方便之力難思，圓對之機多緒。混太空而為量，豈算數之能窮？入纖芥之微區，匪名言之可述。無得而稱者，其為大覺歟！」⁴⁹

⁴⁴ 參見同上文。

⁴⁵ 同註 43。

⁴⁶ 其他讚文參看《全唐文》卷 67；穆宗〈南山律師贊〉，及卷 75：文宗〈華嚴四姐清涼國師像贊〉等。

⁴⁷ 見《全唐文》卷 17。

⁴⁸ 其他唐帝為佛經所撰序文，散見於《全唐文》卷 9、10、15、17、19、49、55、63、97。

⁴⁹ 高宗武皇后〈大周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序〉（《全唐文》卷 97）。

從這一小段序文中，看出武后對佛教苦集滅道四諦理，及因果輪迴觀念的了解透徹，也明白表達對佛陀修行證道而被稱成為大覺者之肯定，是值得令她歸依崇信的對象。

五、從「依法」或「依人」來探討

筆者由以上的探討，發覺諸位崇信佛教的唐皇，大都已經深入了解佛陀教法的內容，雖然為他們歸依、受戒的是祖師們，但其所歸依的對象卻是三寶⁵⁰，他們所依循的是佛陀慈悲的教法，並不排擠外教的存在。這與唐武宗崇信道教的情形，最大的差別就是在「依法」與「依人」的不同。

有句話說：「非器不敏，用者使然。」或許大部份宗教的成立，都是本於善的，但是卻會因為信仰的人作為失當，而產生反效果。「會昌法難」就是起因於唐武宗篤信趙歸真等道士之言，而產生的一次最嚴重的滅佛事件。⁵¹

唐武宗因為寵信道士趙歸真等人，相信他們有一套「長生之術」可習。但「人生而無不死」，武宗非但沒有去分辨他們言語的真偽，且一味地迷戀他們所謂「長生」之術。任憑他們的蠱惑，唆使他受法籙、改名、服食「長生藥」，甚至廢除佛教。⁵²信佛的唐帝，深解佛法意趣，受到佛法的感化，仁民愛物，施行大赦天下、齋月斷屠、在寺院中設立悲田院⁵³以救濟孤苦等仁政；武宗卻相信道士之言，廢除齋月斷屠令，滅了佛教。掌管悲田院的僧尼被迫還俗後，悲田院只得關閉，使許多貧苦的病人不知所措。最後不僅自己因服食「長生藥」而喪失身命，還留給後世的人一個「非明智之不惑者」⁵⁴之醜名。

一個人在決定信仰某一個宗教之前，除了應用智慧來分辨所信仰的宗教之內容外，還必須講求「依法不依人」，這也是正信與迷信最大的不同。相對於武宗的信仰，更可以看出崇信佛教的唐帝正信的程度。

⁵⁰ 即佛、法、僧三者。

⁵¹ 關於唐武宗毀佛事件，筆者於下一個部份將作較為詳細之探討。

⁵² 參見郭朋《中國佛教史》（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民82），p.219。

⁵³ 唐代悲田養病坊的設立，參見鎌田茂雄著·鄭彭年譯《簡明中國佛教史》（《世界佛學名著譯叢42》，台北：華宇出版社，民77），p.211。

⁵⁴ 語見《新唐書·武宗本紀》。

肆、武宗毀佛之因緣

唐代佛教發展到後來，在宗密圓寂後四年，發生了唐武宗毀佛的事件，給整個佛教帶來了沈重的打擊。華嚴宗的傳承與發揚也邁向衰微，史稱「會昌法難」。

唐武宗李炎，是穆宗第五子，在位期間只有六年。他是有唐一代所有的皇帝中唯一堅決反佛的皇帝。據《舊唐書·武宗本紀》中記載：

「帝在藩時，頗好道術修攝之事。是秋，召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，於三殿修金籙道場，帝幸三殿，於九天壇親受法籙。」

說武宗在藩時，就喜好道教有所謂的「長生之術」。才剛剛即位不久，就召集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到宮裡，在三殿修金籙道場，武宗並親自到三殿，於九天壇受「法籙」。當時，雖有右拾遺王哲上疏諫武宗言「王業之初，不宜崇信過當」。疏是奏了，但武宗仍是「不省」。⁵⁵

會昌元年（841）六月，武宗封衡山道士劉玄靖為銀青光祿大夫，充崇玄館學士，並賜號廣成先生。還令道士趙歸真在宮中修法籙，當時的左補闕劉彥謨上疏切諫，後來被貶。

那時的唐武宗因為立志學神仙，什麼人的話都聽不進去。在會昌四年（844）三月，又以道士趙歸真為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，自己也跟從他學習道術。趙歸真乘著受寵於武宗，於是「每對，排毀釋氏，言非中國之教，蠹耗生靈，盡宜除去」。⁵⁶沒想到妄求長生不老的武宗，真的把他的話奉為金科玉律般地相信著。

會昌五年（845）正月，武宗敕造「望僊臺」於南郊壇，道士趙歸真特承恩禮。有諫官上疏給武宗勸諫此事，但武宗仍不採納。後來，趙歸真知道自己已被議論，趕緊向武宗推舉道士鄧元起，說他有長生之術。武宗信以為真，派遣中使迎進。往後，趙歸真、鄧元起、劉玄靖為鞏固道教地位，便聯合起來，不但極力排斥詆毀釋氏，並且向武宗請求拆毀佛教寺院。

會昌五年四月，武宗下敕要祠部檢括天下寺院及僧尼人數。對佛教寺、僧進

⁵⁵ 參見《舊唐書·武宗本紀》。

⁵⁶ 見《舊唐書·武宗本紀》。

行調查統計，作為踏出滅佛行動的第一步。檢括統計的結果，全國寺宇共四千六百所，招提、蘭若約四萬所，僧尼共二十六萬五百眾（實際上應不只此）。同年的七月，敕令合併減少天下佛寺以後，逐步開始採取了滅佛的措施。⁵⁷

唐武宗毀佛的經過，自然是慘不忍睹，拆寺，逼迫僧尼還俗，把寺院的佛菩薩像、鐘磬等，是銅作的就繳交鹽鐵使，打造成錢幣；鐵作的繳交本州，鑄為農器；金、銀等作的銷付度支（等於現在的財政部），只有用土、木、石等材料的像，才可以留在指定不拆的寺裡。在同年八月，詔告天下，宣布滅佛的結果：

「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；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，收充兩稅戶；拆招提、蘭若四萬餘所；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，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。」

並把留下來的僧尼，隸屬管理外國人的部門來管轄。也就是把佛教中出家的僧尼看作是外國人，來顯明佛教是外國之教。將滅佛前後的數目兩相比較，佛教真的幾近慘遭滅教。

原本唐朝開國之初，道者便託言以同是姓李的道教神仙李耳，為唐皇室的遠祖，以使皇族與道者構成血統之關係，唐皇因屛貶抑佛教。⁵⁸好不容易到則天武后，佛教地位超越道教，佛教得以發揚光大，華嚴思想的弘揚，也開始活躍起來。現在，又碰上一個幻想「長生」而偏信道教的唐武宗。他忘記了秦始皇妄求長生不死的教訓，一心一意想學神仙之道，無法分辨真偽，聽從道士所虛構能夠長生不老的謊言，及其反佛之論調而進行滅佛。不料，卻在隔年（會昌六年）三月壬寅，自己因服食道士所給他的「長生藥」而顯得喜怒失常，全身發疽，病情危急。幾天後，不能言說，於是在三月二十三日駕崩。當時的年紀才三十三歲。

這就難怪為什麼《舊唐書·武宗本紀》的史臣要說他

「志欲矯步丹梯，求珠赤水。……不悟秦王、漢武之非，蓋惑於左道之言，偏斥異方之說。」

《新唐書·武宗本紀》中歐陽修也批評他

「其奮然除去浮圖之法甚銳，而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年，以見其非明智之不惑者。」

⁵⁷ 關於武宗實施毀佛之措施，參見郭朋《中國佛教史》（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民 82），p.218-222。

⁵⁸ 參見印順《華雨香雲·道教反佛的伎倆》（台北：正聞出版社，民 62），p.187。

伍、對華嚴宗發展之影響

由於華嚴思想在唐代受到唐帝的崇尚與推廣，大力護持，使得華嚴宗在佛教界的發展中嶄露頭角，並迅速地在唐代流行起來。

唐初，高祖李淵不信佛法，視道教主李耳為遠祖。武德八年（625），詔敘三教先後為道、儒、釋。⁵⁹又因聽任當時的太史令傅奕上表斥佛，請求罷廢，詔文已於武德九年（626）下達⁶⁰，若非遇到「玄武門之變」⁶¹，佛教可能早已遭遇滅佛法難。

唐太宗貞觀年間，統治地位日臻穩固，唐王朝對外交流逐步擴大，經濟、文化蒸蒸日上，對道、儒、釋政策不變。但太宗已信佛並了歸依了三寶，對甫從印度留學歸國的玄奘大師更是禮遇。護持其譯經和講經等活動，並促使法相唯識宗建立。此時，杜順已有華嚴義理初步構思。太宗與杜順和尚已有接觸，屢次詔入內殿問佛法大要，後賜杜順為「帝心尊者」。影響力所及，宮廷內外，朝中大臣及百姓，歸信的很多。

唐高宗從小就是一個孝子。他佛、道並奉，不但未改高祖以道為先的政策，也遵循太宗之優禮玄奘，贊助其譯經，繼續成為唯識宗的有力支柱。這時智儼開始起步專修華嚴，但到晚年才開始弘講華嚴哲理，在高宗的護持下，傾力研究《華嚴經》以及其他大乘經典，並著手選述解釋《華嚴經》之著作，奠定了華嚴宗之成立基礎。

直到女皇武則天實質上掌握唐朝政權，昇釋教於道教之上，⁶²佛教倍受崇奉，華嚴宗出現了轉捩點。武后是法藏在弘揚華嚴思想期間，最大的護法。

法藏自咸亨元年（670）出家，即與唐皇有大因緣⁶³，這使得法藏推廣華嚴的弘法活動，顯得更加簡便與容易。

法藏一出家，便受詔為住持，受具戒後即開講華嚴，以後陸續的一面宣講華

⁵⁹ 參見慈怡法師《佛教史年表》（高雄：佛光出版社，1987），p.80。

⁶⁰ 參見慈怡法師《佛教史年表》（高雄：佛光出版社，1987），p.80。及《舊唐書·高祖本紀》。

⁶¹ 皇太子們爭位的變故，以皇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，共謀殺害秦王李世民，事敗反遭誅殺，後高祖詔立秦王為皇太子，因變故發生在玄武門，故稱「玄武門之變」。參見《舊唐書·高祖本紀》。

⁶² 據慈怡法師《佛教史年表》（高雄：佛光出版社，1987），p.95。記武后將釋教昇於道教之年為天授二年（691）。

⁶³ 有關法藏出家之因緣，參見本文 p.6-7。

嚴，一面又進行《華嚴經》的翻譯，每逢感應祥瑞之兆時，唐皇即下詔表彰。《華嚴經》一經譯出，加上法藏的著作解釋，弘講的助力，使民眾益發了解華嚴。唐帝的推廣助長，使信眾日益增多。後因唐帝屢次詔法藏大師以經咒法遏止寇虐、祈雨、祈雪，彌不皆獲瑞應，令皇室內外對法藏深生信任，法藏趁此奏請起建華嚴寺。自此，有了所依據的經典——《華嚴經》，也有弘揚的根地，經濟力也有後盾，更重要的是，恰好遇到唐帝的全力支持，華嚴思想的盛行，因緣成就。

法藏圓寂後，華嚴宗的傳承曾一度中斷，直到澄觀起而專研華嚴，繼續華嚴的弘傳，在這期間，德宗皇帝是澄觀弘法生涯中不可或缺的支柱。

澄觀平常早已在為大眾講說《八十華嚴》以及所著《疏》、《鈔》。德宗聽到風聲，詔他入京，問佛法大旨，並延入譯場翻譯《四十華嚴》。還時常安排澄觀至殿內，向群臣開示《華嚴》宗旨、闡揚《華嚴經》，及詔其造《四十華嚴》經疏，解釋《華嚴經》，這是不可多得的機會，使得華嚴的哲理，能普及於一般群眾，廣為流布，講次前後共有五十遍之多。自德宗奉其為清涼國師後，澄觀的名聲廣傳，中外台輔重臣，皆同他受八戒禮。朝中多位大臣都請澄觀為他們寫書，使澄觀的華嚴思想，更深入皇室家族。

正因為澄觀國師的名聲遠播，而到了宗密這位能為其續弘華嚴、闡揚一乘圓頓教法的法子，他不但繼承澄觀的禪教結合之說，並會通內外教，化解當時政、教衝突危機。

憲宗元和年間，宗密偶得澄觀所撰《華嚴大疏》二十卷及《大鈔》四十卷，閱後心中疑雲即除，如撥雲見日，自此便開始弘揚華嚴。後來，經澄觀收為法子，便跟著澄觀學習。⁶⁴經過數年請益後，宗密長期住在終南山靜修，並遍閱藏經，也開始他的著作生涯。

唐文宗太和年間，宗密受賜紫袍，敕號大德。於是朝中重臣，開始歸依信佛的很多。宗密也因為結交多位朝中公卿，為他興顯華嚴思想，增長了一分助力。

華嚴宗的開展，由於獲得了朝廷的普遍支持與推崇。領導階層的率先信仰，產生出一股強大的社會影響力，直接推動一般民眾的信仰。這種推動，使得華嚴思想的提倡，發揮了相當重大的作用與幫助。

⁶⁴ 因「泰恭斷臂」事件，澄觀收宗密為法子，其過程有戲劇性的發展，參見冉雲華《宗密》（台北：東大出版社，民77），p.18-20。

結論

經由本文的探討，發現幾位崇信佛法的唐帝，對華嚴五祖在弘揚華嚴思想的過程中，給予相當大的支持與扶助，對華嚴宗及整體佛教的發展，有著決定性的影響。華嚴宗在君權的保護下，教法得以遠佈，寺院也得以維持。據說，唐代的佛教，發展到極盛時，曾出現道教徒棄道為僧的現象。⁶⁵佛教的發展，也傳播到東亞世界，包括渤海、朝鮮、日本、越南的東亞佛教圈。⁶⁶若不是因為唐武宗不信佛而毀佛，佛教在中國歷史上，必能寫下更輝煌的一頁。

有句話說：「佛法盛衰，常與帝道相望，帝之盛，莫甚於唐，佛法因之，大振於中夏。」⁶⁷意思是說：佛法的盛衰，常常是跟帝王的權力盛衰相應，佛教在唐代盛行，因為有帝王的崇信與護持，才能大大的發展起來。⁶⁸

不容忽視的是，在這個中央集權制度下的統治帝王，他必須是一位正信的佛教徒，才能全力護持佛教的各項弘法活動，和給予佛教自由發展的空間。雖然今日宗教在憲法保護下信仰自由，如果領導階層信仰佛教，所帶給社會群眾的廣大影響力和護持佛教發展的助力，應是相同的。

筆者在撰寫本文的時候，感到相當遺憾的是，在筆者的參考資料中，幾乎所有研究唐代教的史學者，一面倒地認為唐帝對扶植佛教的舉動，不外乎政策的考量和政治的利用。這也使得筆者在參考之時，一無所獲。所以，僅就史實方面，憑著筆者本身思考的角度，加以探討，難免落入筆者之主觀意識，思慮尚欠周詳，有待日後，從更為客觀的角度，繼續研究。

⁶⁵ 參見杜繼文·任繼愈《佛教史》(台北：曉園出版社，1995)，p.287。

⁶⁶ 參見鎌田茂雄著·鄭彭年譯《簡明中國佛教史》，收於藍吉富主編《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42》(台北：華宇出版社，民 77)，p.195。

⁶⁷ 見宋·祖琇《隆興編年通論》(叢續 130，p.336b，正面)。

⁶⁸ 參見鎌田茂雄《中國華嚴思想史研究》(東京：東京大學出版會，1965)，p.112。

參考資料及書目：

一、原典著作

- 1.清·董誥等編《全唐文》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
- 2.《舊唐書》 百衲本二十四史（二六）
- 3.《舊唐書》 百衲本二十四史（二九）
- 4.唐·閻朝隱撰《大唐大薦福寺故大德康藏法師之碑》 大正 50
- 5.唐·新羅崔致遠撰《唐大薦福寺故寺主翻經大德法藏和尚傳》 大正 50
- 6.唐·宗密述《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註·圭峰定慧禪師遙稟清涼國師書》 大正 39
- 7.宋·贊寧等撰《宋高僧傳》 大正 50
- 8.唐·胡幽貞纂《大方廣佛華嚴經感應傳》 大正 51
- 9.唐·法藏集《華嚴經傳記》 大正 51
- 10.唐·道宣撰《續高僧傳》 大正 50
- 11.元·念常集《佛祖歷代通載》 大正 49
- 12.元·覺岸編《釋氏稽古略》 大正 49
- 13.宋·志磐撰《佛祖統紀》 大正 49
- 14.（作者不詳）《神僧傳》 大正 50
- 15.宋·宗鑑集《釋門正統》 卅續 130
- 16.宋·祖琇撰《隆興編年通論》 卅續 130
- 17.清·續法輯《法界宗五祖略記》 卅續 134
- 18.元·普瑞集《華嚴懸談會玄記》 卅續 12
- 19.明·瞿汝稷集《指月錄》 卅續 143

二、現代研究

- 1.方立天著《法藏》 東大出版社 台北 民 80
- 2.冉雲華著《宗密》 東大出版社 台北 民 77
- 3.杜繼文 任繼愈編著《佛教史》 曉園出版社 台北市 1995

- 4.郭朋著《中國佛教史》天津出版社 台北市 民 82
- 5.宇井伯壽著·李世傑譯《中國佛教史》 協志工業叢書 台北 民 59
- 6.黃懺華等著《佛教史略與宗派》 木鐸出版社 台北 民 77
- 7.暢耀編著《華嚴寺》 三秦出版社 西安 1993
- 8.南亭法師著《華嚴宗史略》 華嚴專宗學院 台北 民 83
- 9.賢度法師編著《華嚴宗五祖論著精華》 華嚴專宗學院 台北 民 84
- 10.鎌田茂雄著《中國華嚴思想史□研究》 東京大學出版會 東京都 19665
- 11.煮雲法師著《皇帝與和尚》 佛光出版社 高雄 民 78
- 12.陳援庵著《釋氏疑年錄》 天華出版社 台北 民 72
- 13.慈怡法師主編《佛教史年表》 佛光出版 高雄 1987
- 14.藤島達明·野上俊靜編著《東方年表》 平樂寺書店 京者 1995
- 15.印順法師著《華雨香雲·道教反佛之伎倆》 正聞出版社 台北 民 62
- 16.中村元等著·余萬居譯《中國佛教發展史(上)》 天華出版社 台北 民 73
- 17.藍吉富編《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42》 華宇出版社 台北 民 77